

## 第三章 高陽的生平、作品及《慈禧全傳》的創作理念

### 第一節 生平事略

高陽，原名許晏駢，譜名儒鴻，又名雁冰，筆名曾使用過孺洪、郡望、史魚、龍大野、游勇和高陽等。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農曆三月十五日）出生於浙江杭州橫河橋一個沒落的望族之家，一九九二年六月病逝於臺北。而關於高陽的生年過去一直有兩種說法：一說出生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一說出生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sup>1</sup>對於像高陽這樣一位現代重量級的歷史小說家，理應對其生年有所釐清，而根據李瑞騰和江澄格兩位先生的考證，高陽應是出生於一九二二年為是。<sup>2</sup>

高陽的父親許寶樸，號志勤，是仁邑秀才，曾任絲繭捐徵局局長，民國初年，經族人公推為許家義莊「莊正」，十餘年經營中曾先後增置義田千餘畝。母親黃婉係大家出身，能言善道，有「女秀才」之稱。兩夫婦共育有子女八人，高陽是家中老么。

高陽出身在一個堪稱錢塘巨族，歷代祖先多人在清朝為官，是累有功名的宦宦之家。據高陽所撰〈高陽許氏橫橋老屋舊址碑記〉一文，稱：

許家源出富陽沈氏，始祖諱顯榮，號五雲，幼年失怙，以表親賈氏提攜成立。及長，貿遷南北，頗有所獲，顧以性好奢華，施恤揮霍，家計遂窘，嘉靖十五年鬱鬱歿於京邸，得年五十有七。五雲公於四十八歲後，連舉二雄，長曰紀，次曰立，孤露無依，賴表姑夫杭州前衛指揮千戶許魁，攜返杭州撫養，更名為許紀，字文綱；許立，字春園，視如己出。文綱、春園兩公亦感恩圖報，父事之。及許千戶既歿，文綱公亦下世，春園公圖歸宗而果，遂入籍仁和，是為吾許氏二世祖。<sup>3</sup>

<sup>1</sup> 臺灣中華書局《當代名人錄》、《大陸台灣新文學辭典》和《台灣文學家辭典》等，具記載高陽的生年是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

<sup>2</sup> 江澄格：《歷史小說巨擘——高陽》（臺北：三思堂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6月初版），頁22—27。

<sup>3</sup> 高陽：〈高陽許氏橫橋老屋舊址碑記〉（聯合報，1992年7月20日），第25版。

高陽總聽得津津有味，耳熟能詳。其母有一次拿著祖先留傳下來的狹長玉版，告訴求知慾旺盛的高陽說，這叫「笏」，乃是古代大臣上朝見皇帝時所拿的器物，一般都是用玉、象牙或者竹子製成，上面可以記事。另外，黃婉老夫人也愛看報紙，被族人稱為「女秀才」。她不大愛管家事，多交由長女負責料理。除閱讀報章外，也看上代留下的文件、信件等，她對高陽講許家的軼事及報紙上的新消息，對於時人如楊虎、蔣介石、宋氏三姐妹等都有自己的見解。她還熟知杭州其他世家的瑣事，如岳官巷胡雪巖家、狀元弄鄭家、清吟巷王文韶宰相家、東山弄鍾狀元家等。高陽在這方面很受母親的影響，也形成他日後寫作時，特別重視人際網絡、事務的前因後果等。

高陽在橫河老家時代，給人的印象是喜歡看書。據說他常常坐在藤椅上看得廢寢忘食，叫都叫不應。他秉承了母親個性的一些特點，也喜歡雜學；當母親解釋不了他所提出的疑問時，他便去求教同村的許氏老族親，往往可以從老族親那兒得到些滿意的答案。根據許以祺的說法：高陽父親因義莊家務糾紛含憤而死，其時才十三歲的他曾對許道同說他長大了要出名，要比許家所有的人名氣都大。<sup>7</sup>高陽在杭州宗文中學初中未畢業時，即隨家逃難至上泗鄉上城埭，後轉逃難至靈隱，再返杭州。返回杭州後，報名青年會中學讀高一時便常投稿，此後便一直和文藝保持聯繫，日後擔任記者時更常寫影評。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高陽在家賦閒了一陣子，後進入《東南日報》當記者。一九四九年高陽二十七歲，因時代的因素而投入軍旅並進而來到臺灣。若不是有機緣來到臺灣，他在大陸的生活可能並不理想，來到了臺灣脫離了老家，反而開啟了他另一片璀璨的人生。

## 二、軍旅生涯（一九四七—一九五九）

抗戰勝利後，高陽在幾家報社如《正報》、《當代日報》、《之江日報》和《東南日報》等待過，但時間都不是很長。進入報社做記者、跑新聞，對於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極富挑戰性的工作，新奇而又刺激，在新聞採訪時探微索密、發揮追根究底的精神；在評論時事、月旦人物的公正態度，對高陽應有莫大的吸引力，也的確蠻符合他不羈的個性。

<sup>7</sup> 同註4。

在工作的磨練下，高陽的寫作技巧、觀察分析的思維和探索求證的能力等，均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對於他日後快筆速成、大量多產、限時完稿、多管齊下、數部同載、時長面廣，且能涇渭分明的寫作特點，應該起了一定的助益。

之後沒多久，高陽在杭州老家和幾位雖不甚熟稔，但堪稱志同道合又喜歡舞文弄墨的年輕朋友，如宋瑞（本名吳詠九）、莊練（本名蘇同炳），以及魏子雲、周德培、孫尚志等諸位先生，先後考入設在杭州笕橋的空軍官校，擔任文書工作。遷臺之後的空軍官校校長即為胡偉克將軍，他為鼓舞士氣，使一批新招進來的文職人員不但有發揮的園地，更能轉移思鄉之苦，特地在校內創辦一份《笕橋報》的軍中週報，其中有一版是副刊，此時高陽等雖還算不上是文壇名家，但也有一定的程度，因此順理成章的成了這份報紙的特約常客，時有文章發表，先由軍中的小報，漸及校外大報，稿約相繼而至，長篇短文亦陸續見諸報端，高陽似乎已由兼差玩票的性質，朝專業之路邁進。

一九五一年代初期，時任空軍總司令的王叔銘上將升任參謀總長，他主司文書的機要秘書陳蘅需要添個幫手，後來成為研究《金瓶梅》專家的魏子雲先生便推薦高陽。早就有意往繁華的臺北發展的高陽，自然欣然答應，這也成為高陽一生事業的轉捩點。當時高陽的官階是空軍上尉，照說他既已待在參謀總長的身邊，只要表現中規中矩，將來就算不是個將官也是個上校，但高陽此時卻因略有文名而在金錢上揮霍，並開始追求女明星了。高陽率真不羈的個性，和講究階級、紀律嚴整的軍旅環境其實是有格格不入的，但另一方面在軍中規律的生活，卻使得高陽自幼養成的閱讀習慣不受間斷，成為他寫作上資料的源泉。當初航校的文職人員以徵集「優秀的國學人才幹部」<sup>10</sup>為目標，招進的文書官水準頗高，有許多人日後在文化界有不錯的發展，如和高陽同期的莊練（蘇同炳）、宋瑞（吳詠九），前後期的有走學術路線的朱介凡、魏子雲。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後來和高陽一同辦資遣，進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服務的蘇同炳，他不僅自己撰寫掌故，同時也是高陽歷史資料的長期提供者。

<sup>8</sup> 莊練：〈歷史小說家高陽走入歷史〉（《中央日報》，1992年6月2日）。

<sup>9</sup> 林青：《高陽的歷史風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8年2月初版），頁168。

<sup>10</sup> 董世璋：〈高陽來台的故事〉（《聯合報》，1992年6月20日），第二十五版。

高陽的官階雖僅至上尉，但不可否認的這一時期的高陽「能接觸到很多傑出的軍中將領如胡偉克、祝樞壽及王叔銘等人，自然影響他的氣度與見識」<sup>1</sup>，尤其是待在參謀總長王叔銘上將身邊任秘書時期，有許多的機會近距離觀察到官場上種種微妙的關係，也能知悉事務運作下的內幕底蘊。對於像高陽這樣寫作材料幾乎全由書中得來的歷史小說家而言，因為有了這層機緣，才能將人情世故的牽絲攀藤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九六一年，高陽在接受完短期的軍中文官軍訓後，竟然放棄升少校的機會而堅持「資遣」離去。於是，高陽按照規定領取了一萬多元臺幣的資遣費離開軍中，進入新聞界開啟他真正發光發熱的創作階段。

總計在岡山和臺北的軍旅生涯中，高陽創作的作品依次有：一九五一年的〈猛虎與薔薇〉與〈罪罪〉等中長篇文藝小說，在《中華日報》的南部版和南臺灣報紙上連載。一九五二年參加香港《亞洲畫報》小說徵文，入選獲得大獎<sup>1 2</sup>，自此開始逐漸嶄露頭角。一九五三年中長篇文藝小說《猛虎與薔薇》和《罪罪》單行本發行，由高雄百成書局出版。這兩本小說對高陽極具意義，因為那是他最早出版的兩部作品。一九五四年發表〈落花生〉，在《中華日報》南部版連載，開始受到文壇人士及社會大眾的注意。爾後北上期間，他又陸續的創作了有《紅葉之戀》、《凌霄曲》、《花落花開》、《避情港》、《紅塵》和《桐花鳳》等六部作品，唯基於長期和高雄的地緣關係，高陽這六部作品都交由高雄出版社發行。

### 三、野翰林的創作歲月（一九六一年—一九九二年）

一九六一年高陽經由南郭（本名林適存）的推薦而進入《中華日報》撰寫社論，一九六三年二月起又受聘為專任主筆，從此工作漸趨穩定。但高陽在軍旅生涯中後期已出現的無所節制的生活，在此時有變本加厲的跡象。據琦君女士回憶道：

李翰祥在臺灣成立國聯電影公司，擁有國聯五鳳，籌拍歷史巨片，由高陽任總編劇。……有一天，他穿了一身最時髦的大花夏威夷衫，搖搖擺擺到外子辦公室來，摸出一張李翰祥開給他的支票，托外子暫時調一下頭寸。票面額很高，可見他的收入之豐。可是他拿回去不

<sup>1 1</sup> 謝海濤：〈高陽與中華日報〉（《中華日報》，1992年6月27日）。

<sup>1 2</sup> 同註8。

到一兩天就呼朋喚友地分享光了。<sup>13</sup>

但是當一九七一年高陽升任《中華日報》總主筆時，基於表率和责任感的趨使，其生活作息乃至待人接物上則有了重大轉變：

一年下來，他不僅敬業樂群，負責盡職，而對其個人生活習性，也有若干改變。譬如在許多晚餐場合他既不鬧酒，更不貪杯，因為他知道晚間要看社論，甚至要自己動筆寫社論。有朋友開玩笑式地說：「高陽當起『官』來，簡直變了一個人！」可見一個有才智的人，其立身行事往往有甚大的彈性與可塑性，高陽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sup>14</sup>

由上述兩則引文知悉，隨著高陽在報社級職的高低所負責任的不同，他可以有文人氣息兼世家紈袴的不羈性格；也可以表現出自我克制、留心事務，和以團隊為重的領袖風範。

而關於「高陽」這一筆名的由來眾說紛紜，但歸納起來約有三說：

第一、郡望說。高陽自己說：「我用高陽這筆名，是因為本姓的郡望如此。」又說：「我絕非因為有『高陽酒徒』這個典故，特意取高陽為筆名。」<sup>15</sup>許氏的郡望即指浙江杭州橫河橋一帶，而高陽還有另一個筆名就叫作「郡望」，頗有緬懷昔日清季時期為地方名望、官僚大家族之慨。

第二、酒徒說。此說較為一般文人所用，成語有「高陽酒徒」，典故出自《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後便以「高陽酒徒」泛指好飲酒而狂放不羈之人。而一般文人之所以當其「酒徒」之說，實肇因於高陽本身好酒貪杯且又豪放不羈的個性而「想當然耳」！但不論是證諸高陽的祖籍，以及其家族遷徙活動的路線來看，都看不出有和古地名高陽（今河南省杞縣）有直接關聯性。此外，高陽也從未承認此一說法，更證明此

<sup>13</sup> 琦君：〈星晨寥落念高陽〉，《中央日報》，1992年7月20日，第16版。

<sup>14</sup> 楚崧秋：〈和「怪」人共事——與高陽辣手著文的八年歲月〉，《中外雜誌》，第52卷第2期，1992年8月，頁17—19。

<sup>15</sup> 高陽：〈酒徒——高陽遺作二〉，《聯合報》，一九九二年6月7日，第25版。

說之不確。

### 第三、牢騷說。關於此說，高陽的密友張大春先生曾提出說明：

雖然高陽本人嘗含糊其言，但是他這個筆名卻是「有典可稽」的：屈原《離騷》首句即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而一部《離騷》又正是一部牢騷。屈原在將近兩千三百年前寫下「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之句的時候，對於他所處身的現實確乎充滿了一股幽憤激切之情。太史公大約不願意過於強調這一個情感或情緒面的義理，才曲筆把這一部牢騷解成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實牢騷就是牢騷，對現世沒有牢騷，屈原就不必開宗明義將自己的身世寄託於一遠古之「黃金國度」；顓頊（帝高陽）時代；對現世沒有牢騷，高陽也不會摘取《離騷》章句中的掌故、援引屈原情感中的寄託為筆名。從這一點上看：非僅牢騷自有其掌故，一個充滿掌故的世界大約也正是紓解牢騷的桃源。<sup>16</sup>

林青先生認為「郡望說」和「牢騷說」彼此之間乃一而二、二而一的緊密聯繫，只不過「牢騷說」終究是更傳神、更貼切些。<sup>17</sup>高陽的「牢騷」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他對舊史（特別是清朝）情有獨鍾，因此他藉由故紙堆中的考證為文，追索為何內心有許多不合時宜的牢騷根源；另一方面，他不滿於正統史官之立足本朝的詮釋角度，因而藉由大量的筆記小說、方志、書牘等資料，以「信而有徵」的姿態挑戰正統史學和紅學，因之在他大發牢騷為文之餘，連帶引起若干史學界及紅學界學者的批評，而有一「自封野翰林」之說。

「自封野翰林」其實是高陽的「傲氣」與「遺憾」的表現。由於其個性的特異和學歷不高種種緣故，儘管他努力自學、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考證，一生創作小說、專論眾多，卻仍然不為正統學術界所認同，更無法使自己在仕途上充分得到提攜重用。因此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一群文學界的友人們為高陽歡慶六十五歲生日之時，高陽於酒過三巡微醺之際，朗聲宣稱自己是「野翰林」，末了他又為此特刻了一枚閒章，名為「自封野翰林」。<sup>18</sup>

<sup>16</sup> 張大春：〈搖落深知宋玉悲——悼高陽兼及其人其書其幽憤〉，收錄於《文學不安——張大春的小說意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頁99—100。

<sup>17</sup> 同註9，頁159。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高陽因急性酒精性肝硬化併敗血症，溘然長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一歲。總計其一生創作有：小說七十五部（其中現代小說十四部、歷史小說六十一部）、傳記及考證等共十六部、學術專著四部、雜文二部、合著二部、編校七部、論文七十七篇，洋洋灑灑涵蓋古與今、雅與俗，在現代作家中實屬難得者（詳本章附錄二）。

#### 四、多味人生的舊式文人

高陽甫逝世時，有不少報章形容他是「中國最後一位舊式文人」，除了因為作品中充滿傳統知識份子的情懷外，這也是對高陽一生養生無道、治生無方的總體印象。菊人詡之為「奇才」、也稱之為「庸人」；<sup>19</sup>魏子雲則擬之為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人生態度與「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的日常生活，正是高陽的最佳側寫。<sup>20</sup>的確，美酒與美食一向是高陽的喜好之物。高陽是一位「大飲者」，擅用典故的他每天都要飲「青酒從事」，此乃因為桓溫的主簿稱美酒為「青州從事」，劣酒為「平原都督」之故。

此外，高陽雖然將故鄉的經營之神——胡雪巖，寫得虎虎生風、風華再現，甚至引起若干中外讀者欲藉由《胡雪巖三部曲》以學習「胡大財神」的經商之道，或藉此瞭解中國官、商間的微妙關係，但高陽本身的理財、治生之術卻是相當糟糕的。關於他的金錢觀，高陽曾說道：

錢者「泉」也，故應流通了才能發揮錢的最高價值。錢應為生活安定的保障，所以「積穀防飢」的觀念應是值得提倡的，但應有限度，逾限則一汪死水，失去「泉」的意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一個人賺錢維生能保持一個不枯竭的源頭是最理想的。<sup>21</sup>

<sup>18</sup> 同註 9，頁 102。

<sup>19</sup> 菊人：〈奇才、庸人！悼好友高陽兄逝世〉（《中央日報》，1992年6月19日），第 16 版。

<sup>20</sup> 魏子雲：〈千金散盡還復來——高陽的豪放性行〉（《中央日報》，1992年6月2日），第 16 版。

<sup>21</sup> 同註 9，頁 205。

## 第二節 作品概論

### 一、高陽的歷史小說

高陽一生共創作了七十五部的小說，其中屬於現代小說題材的有十四部，而歷史小說則有六十一部。這六十一部作品依題材可分為六大系列：

- (一)、宮廷作品系列：有《慈禧全傳》六部（含《慈禧前傳》、《玉座珠簾》、《清宮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和《瀛臺落日》）、《乾隆韻事》、《翁同龢傳》、《李鴻章傳》、《漢宮春曉》、《王昭君》和《金縷鞋》等。
- (二)、官場作品系列：有《清官冊》、《大將曹彬》、《百花洲》、《鐵面御史》、《楊門忠烈傳》、《同光大老》、《水龍吟》、《八大胡同》和《金色曇花》等。
- (三)、商賈作品系列：有《胡雪巖三部曲》（含《胡雪巖》、《紅頂商人》和《燈火樓臺》）、《胡雪巖外傳》（含《清幫》和《血紅頂》）。
- (四)、紅曹作品系列：有《紅樓夢斷四部曲》（含《秣陵春》、《茂陵秋》、《五陵遊》和《延陵劍》）、《曹雪芹別傳》、《三春爭及初春景》和《大野龍蛇》等。
- (五)、名士、俠士作品系列：有《風塵三俠》、《少年遊》、《緹縈》、《梅丘生死摩耶夢——張大千傳奇》和《鳳尾香羅》。
- (六)、青樓作品系列：有《李娃》、《狀元娘子》和《小鳳仙》等。<sup>2 3</sup>

綜觀高陽的歷史小說，儘管其作品卷帙浩繁，年代從戰國到民國上下兩千餘年，但是高陽的歷史小說作品抓住了幾個下筆的支點，也就是利用這幾個支點，將原本枯燥的史料、典籍，轉化為具恢宏的氣勢、觀察入微和熟悉人情世故的大眾作品。分析高陽所有的歷史小說，可以整理出他利用了「宮廷及官場的權力鬥爭」、「中國傳統社會下的人情世故」和「對

<sup>2 3</sup> 以上作品分類，依江少川和林青兩位整理而成。江少川：《解讀八面人生——評高陽歷史小說》（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2月出版），見目錄。林青部份，同註9，頁1—2。

知識份子的稱許與批判」三大支點撐起他的小說世界。

#### 甲、宮廷及官場的權力鬥爭

第二章提到，中國歷史主要是站在統治階層的立場作記錄，較少提到中、下階層的生活和文化，因此高陽的第一個支點便是對宮廷和官場上的權力鬥爭進行精心的描寫。在《再生香》中，高陽脈絡分明地寫出宮廷鬥爭的複雜和激烈，讀來頗撼人心魄。在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晚年，他最寵愛的「大妃」為他生了三個兒子，即是排行十二的阿濟格、十四的多爾袞和十五的多鐸。這同母的三兄弟掌握了八旗一半的精銳部隊。這其中多爾袞最得太祖寵信，地位在諸王之上，因此當順治皇帝六歲登基之後，他便以攝政王之姿掌握真正的大權。但是當多爾袞一死，阿濟格便認為理應由他接替多爾袞的權力和地位，因而與諸王子發生了嚴重衝突。阿濟格原擬以武力奪權，卻因操之過急，以致被諸王子制服後監禁。然因其不服而在獄中大吵大鬧甚至縱火，諸王忍無可忍經會商後決定處死他。大妃的三個兒子多鐸、多爾袞和阿濟格先後死亡，八旗一半的兵力自然為諸王所瓜分，這一來又造成鄭親王濟爾哈朗有機可乘了。

封建時代的中國是一家天下」的統治模式，為了至高無上的權柄，可以父子、母子或手足之間相殘，將人的內心醜陋發揮到極致。

另外，在《玉座珠簾》和《清宮外史》中，則多有描寫官場上的明爭暗鬥。同治以後，軍機處由恭親王奕訢領導，其餘四位軍機大臣照慣例是「兩滿兩漢」。而其中的兩漢為了平衡「南北」的士紳權力板塊，一向都是不敢稍有偏私。到了北派李鴻藻開缺之後，南派領袖沈桂芬竟打破慣例，引進他的門生王文韶而引起北派士林大為譁然，此後一直到清代滅亡的政爭不休，都和這一段「南北失衡」有密切的關係。

除了描寫宮廷和官場上的權力鬥爭外，高陽也不忘對明君和清官記上一筆。儘管封建統治下的官場有許多黑暗的怪現象，但仍有一批真心維護社稷、以黎民百姓為重的清官。他們兢兢業業、自奉甚儉，而在任上留有德政佳績，當他們為天下蒼生計的時候，正好是與貪官污吏衝突最劇之時，這除了真實反應歷史原貌外，也看出高陽心中強烈的民本思想。《清宮外史》中，時任湖北藩司的閻敬銘為堅決懲辦仗總督官文之勢，而姦殺民女的張玉，特地找中堂官文以請示察辦，然官文

寵愛張玉而稱病不見，閻敬銘使出「水磨」的功夫，叫跟班拿來鋪蓋，就在總督衙門的司道官廳一住就是三天，直到中堂大人「病癒」開始辦公為止。這項義舉轟動了湖北的官場和民間，最後官文終於屈服，不但懲辦為惡的張玉，並且保舉閻敬銘任山東巡撫，就連遠在北京的慈禧也略有耳聞，日後升閻敬銘為戶部尚書，算是清官難得的「功德圓滿」案例。

除了清官，高陽也結合史實，描寫「好皇帝」的形象。在《清朝的皇帝》中提到康熙：「當我看到康熙皇帝的事蹟時，不禁感慨萬千。康熙時代，西方科學大量傳入中國，他本身即深受湯若望的影響，成為中國最具科學精神的皇帝。對任何事，他均要求親眼看見試驗和辯駁的過程。而對於臣子的進言，即使有時令他感到不悅，他也以理性的態度分析判斷，而且只要對國家有益，他必定採納。正因為如此，康熙時代是歷史上難得的盛世之一。」<sup>24</sup>《清宮外史》裡，十四歲的光緒皇帝即為「中法戰爭」而憂形於色，特別是在外侮日亟的時候，更覺得老佛爺的聽戲為荒唐景象。因此他雖然身處弦歌處處、清音繞樑的暢音閣中，卻心繫局勢非常緊張的基隆、馬尾。光緒帝是一位有心卻十分無力的皇帝，高陽也不忘對他寄予無限的同情。

## 乙、中國傳統社會下的人情世故

所謂人情世故，重點在如何參透「情」之一字，而參透還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用世時能得心應手、不著痕跡。《曹雪芹別傳》裡有位第一流的人物方觀承，他曾經對年少的曹雪芹分析「情」之一字的內涵：「人間的大學問，無非一個『情』字。做事容易做人難，難就難在這個『情』字，不容易料理；情而不情，不情而情；情中有情，情外有情，且不說料理受貼，先能分辨得清，就很不了不起了。」與其說這是方觀承的高論，不如說是高陽的真實感受：「難做人，做難人，做人難」，就道出人生處世上——特別是傳統中國社會做人之道的艱辛。

傳統中國下，人情關係如同一張巨大的網絡，由此及彼，由親及疏，一個人如果善於處理各種社會關係，當可以如魚

得水，左右逢源，即使萬一遇上風波，也較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相反的不知變通、過於單純，乃至於抱定潔身自好宗旨者，最終易處於舉步維艱之境，甚而成為有心人「誘過」的箭靶子而招來殺身之禍。《緹縈》有段話提到：「世間不測之禍，起於妒忌怨毒，切記，切記！」《曹雪芹別傳》則有：「要知道藏龍臥虎之地，龍要藏，虎要臥，才能久。」另外，高陽筆下的胡雪巖最常掛在嘴上的幾句話有：「前半夜想想自己，後半夜想想別人。」「花花轎子人抬人」，「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等等，無不透露出中國傳統社會下的人情世故之理。中國傳統社會最常出現的另一種現象，是大家的興起和衰落，其過程每每令人唏噓不已，高陽的紅樓系列《延陵劍》就反映了這種委婉曲折。曹家有四個丫鬢：春雨、夏雲、秋月 and 冬雪。從曹老太太一死，震二奶奶便大權獨攬，越發跋扈。秋月的處境十分艱難，雙芝仙館有個春雨在那裡把持，當然不願意秋月去多管，加以震二奶奶暗地裡撐腰，春雨越發跟秋月較上了勁，而秋月因答應過老太太，又有太太的托付，而這些內情卻全說不得，只好委曲自己來盡力敷衍，唯遇到春雨臉色比較好時才很婉轉地提出建議；然春雨經常不作聲，秋月則拿她毫無辦法。總之，大家族事務中的種種勾心鬥角，其實也是一種微型的政治鬥爭。

為人處世「手腕」和「策略」是不可少的，高陽的小說裡也充斥這樣的描述。以官場的「送禮」一項而言就大有講究，送錯了禮或送錯了人，不但可能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引來禍端。《慈禧全傳——胭脂井》裡，受命為祝賀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即位六十年慶典的特使張蔭桓，於放洋之前已得到某內務大臣的授意：回國之時要有外洋新奇的珍寶以上獻太后。張蔭桓當然謹記在心，歸途經過巴黎，正逢拍賣拿破崙的遺物，張蔭桓以重金買到一顆頂級的「祖母綠」，另外又配上一副金剛鑽的串鐲；這份貢物實在是很珍貴了。待回京覆命將貢物呈獻入甯壽宮時，有人提醒張蔭桓說：「也該給李總管備一份禮。」然倉促之間，無以應付，只好託人示意，容後再補。壞就壞在張蔭桓將此事給遺忘了，因之得罪了李蓮英。李蓮英一口氣嚥不下，伺機報復。一天，當慈禧太后把玩這祖母綠而讚不絕口時，李蓮英冷冷說道：「也真難為他想不到！難道咱們就不配戴紅的？」此話一出，慈禧太后勃然變色——觸及了她五十年的隱痛，漢人大家的規矩，正室穿紅，妾媵著綠；慈禧太后一生的恨事，就是未曾正位中宮。因此之故，張蔭桓從此失寵了！可見宮廷、官場送禮之事如何複雜有學問了。

### 丙、對知識份子的稱許與批判

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描寫，是高陽歷史小說的另一個重要支點。中國的知識份子，普遍受到儒家孔子的「邦有道則兼善天下，邦無道則獨善其身」觀念影響，因此他們維生的方式，不外乎做教師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以取得一定的俸祿，而絕大多數的情形是讀書是為了做官。既然做了官，當然得問做官的目的為何了：是為了天下黎民著想呢？抑或是只為了自身顯耀於世，從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呢？高陽在《清官冊》中所反映的，是康熙在用兵的四年中，更了然於統治之道。當時支持明朝的遺民志士還很多，然而吳三桂卻不能得到他們的助力，只因為吳三桂犯了讀書人的大忌——不忠不孝且不義。一個王朝的興廢，全繫於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則端賴讀書人的態度，而讀書人的態度則又取決於這個王朝的做法。

高陽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進取心理和人格人性帶有欣賞和讚頌的態度，這就與他的歷史小說中大量揭露封建官場中的昏庸黑暗、勾心鬥角的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高陽非常重視士大夫的積極作用。他在《同光老》中談到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析：「研究歷史，我以為首當注意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中心勢力，如兩漢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鎮，則必形成割據。唯有高級知識份子成為中心勢力，始能開統一之盛運，讓老百姓過幾十年太平歲月。」弔詭的是，當文治既定之後不久，又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門戶之爭。

除了前面提到在《玉座珠簾》和《清宮外史》裡的「南北之爭」外，高陽也在《胡雪巖（下）》藉由嵇鶴齡之口，說明執掌權柄者若非具有真才實學，而僅是志大才疏的草莽之徒為靠不住的。嵇鶴齡對胡雪巖分析道：「僅有志向，不能識人、用人，此之謂『志大才疏』，像那樣的人，生來就苦惱！」「不得志的時候，自覺埋沒英才，滿腹牢騷；倘若機緣湊巧，大得其發，卻又更壞！」「這個道理，就叫『爬得高，跌得重！』他的爬上去是靠機會，或者別的人有意把他捧了上去的；捧上了臺，要能守得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這一摔下來，就不送命，也跌得鼻青眼腫。所以這種志大才疏的人，怎麼樣也是苦惱！」「稽諸史實，有許多草莽英雄，因緣時會，成王成帝，到頭來一場春夢，性命不保，說起來大都吃了這四個字的虧（即「志大才疏」）。」

因此，高陽特重「實學」，「能利益天下蒼生」的知識份子。例如《印心石》中，儘管仍處人生困頓階段的陶澍，卻依然默默的在經世致用之學上下功夫，期待有朝一日得位時能付諸實行。高陽寫道：「對漕運、水利、鹽務的積弊瞭解越多，痛恨越深；蓄著滿腔的抱負，只要一且得志，必定痛加改革。」相反的，高陽對於只會死讀書並自鳴得意者，則予以鄙薄的譏諷。譬如穿梭於《慈禧全傳》裡的理學家倭仁、徐桐等，遇事時唯程朱之「理」，並以此「理」來面對急如星火的軍國大事，大清有這班人又何能振興呢？

## 二、偏愛清代史事

高陽共著有歷史小說六十一部，其中清朝的部份則有三十二部，共四十六冊，佔他全部的歷史小說一半以上，可見他是多麼的偏愛清代，而他的清代歷史小說的水準，一般來說也是最高的。<sup>25</sup>分析箇中原因，恐怕和其許家在有清一代多人為官的風華歲月有關，也就是說高陽是基於對家族先輩「行誼」的懷想，而促使他傾全力打造「全清史」的寫作範圍。關於「全清史的寫作範圍」，陳慧如在其論文裡分析道：

由高陽發表作品的先後次序來看，高陽大體上是由清朝末年入手再轉戰清朝各個年代。如果將《恩怨江湖》、《李鴻章》視為《胡雪巖》、《紅頂商人》連載的副產品，高陽的前十五部小說除了《清官冊》之外，在時間上全部隸屬於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時期。一直到一九七六年開始連載《乾隆韻事》、一九七七年連載了《秣陵春》才正式進入康熙、雍正、乾隆朝……一九八五年之後，除了胡雪巖系列與紅曹系列必須做一完結之外，他繳出的作品分別是《丁香花》、《再生香》、《醉蓬萊》、《水龍吟》及《蘇州格格》，除了具有特殊寫作動機的《醉蓬萊》屬康熙朝外，其他作品所屬年代正好落在作品較少的順治、嘉慶、道光時期……。<sup>26</sup>

<sup>25</sup> 楊照在〈歷史小說與歷史民族誌〉一文裡提到：「我想大膽地提供兩條評判高陽歷史小說的準則：一是後期的一般總比前期的好；二是寫清朝的比寫其他時期的都好。」本文收錄於張寶琴主編的《高陽小說研究》（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頁138。

<sup>26</sup> 陳慧如：《高陽清代歷史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39—40。